

# 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下我国产业链稳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尚涛 樊增强

**摘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产业链格局正面临深刻的重构与调整。与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相比,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受经济与非经济等多重叠加因素的影响,凸显出区域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重构改变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与发展环境,部分新兴经济体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对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规锁”效应,倒逼我国加快产业链结构升级。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应保持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相对稳定,构建高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体系,以本土“世界一流企业”为抓手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链各环节核心技术攻关与主导能力,构建有利于我国产业链升级的新型国际循环。

**关键词:** 全球产业链重构;战略博弈;产业链升级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2-003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外部环境,以低成本生产要素优势和一系列优惠政策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充分发挥要素禀赋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一方面,将我国劳动力等丰裕的生产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生产设备、品牌等相结合,破解了要素禀赋结构性不足对我国生产端的制约;另一方面,充分迎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市场需求,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破解了我国低收入条件下需求拉动不足的问题,显著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演进,受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与博弈加剧以及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等多重叠加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基于经济效率原则的

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与调整,全球产业链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重构趋势。在全球化变局下,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相互叠加,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国家作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参与主体,成为塑造新的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力量,扰动了全球产业链的自发配置,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地理再分布与重构。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动态与趋势、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因素、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升级路径、全球产业链重构与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等多个方面。例如,郭宏、伦蕊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认为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等多重因素,将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sup>[1]</sup>。杨丹辉认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收稿日期:** 2025-09-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本土产业核心技术内生与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研究”(22YJA790046)。

**作者简介:** 尚涛,男,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072)。樊增强,男,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 030031)。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中美大国竞争升级,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逐步出现本土化、区域化、短链化等新趋势、新动向<sup>[2]</sup>。周楨认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等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格局呈现出智能化、短链化、绿色化、本土化、近岸化、区域化、多元化、封闭化等特征,对我国产业链升级带来了诸多挑战<sup>[3]</sup>。屠新泉认为,全球产业链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多重因素下快速重构,全球化进程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倒退趋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和阵营化的风险,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间呈现互动演进趋势<sup>[4]</sup>。刘志彪、李銮溟认为,面对当前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多元化、内向化和政治化趋势,我国应以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推进由内需牵引的“主场”全球化<sup>[5]</sup>。黄新飞、郭瑞琪认为,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传统经济发展路径与国际竞争格局被改写,对外贸易遭遇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抑制,亟须增加出口贸易韧性,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加快推动产业链转型<sup>[6]</sup>。现有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动力、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等方面,而对于如何系统性地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契机加快我国产业链升级步伐等的论述还较少。因此,本文尝试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态势下,系统分析其性质、特点与演变趋势,以在国内外产业链整合与互动的条件下为我国产业链稳定与升级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 一、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出现的多元动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经历了多轮转移,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将全球生产分割中的组装制造部分向发展中国家布局,促使国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分工模式转变。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各国依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技术能力与其他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国际分工。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在生产组装、加工制造等中低端环节参与国际分工。然而,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布局呈现出重大的变动趋势,全球产业链分工受各种复杂动因的影响,在布局上逐渐呈现向特定区域、集团收缩的趋势,产业链本地化、

近岸化、政治集团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具体而言,与传统全球产业链的经济效率分工相比,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出现的动因如下: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较强的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的内在动力。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全球化分工与制造业外迁,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节约以及分工效率的提升,但“去制造业化”也在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与创新能力等方面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以“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形式吸引制造业回归,以解决其制造业空心化、就业岗位流失、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产业公地”缺失与创新能力不完整等问题,就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的内在动力。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产业链韧性、产业链安全可控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外部冲击之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特定情况下发生断裂、受阻的风险被各国关注,促使各国在产业链安全与全球化分工效率之间寻求平衡,从而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多样化发展,以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三是全球产业链竞争关系发生变化。在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坚持互补的差异化分工。然而,随着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上升,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互补性不断下降,而竞争性不断上升,因此“规锁”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动机。四是各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先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步伐,各国力图在未来产业与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从而占领科技与产业新赛道,赢得未来竞争的先机。五是基于大国博弈的国际政治战略利益考虑。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被打破,国际政治竞争性更加凸显,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战略发生重要转向,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以各种方式削弱中国的产业链实体经济基础与关键环节中的持续升级能力,以遏制中国的持续崛起,这也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动机。

##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特征

与传统的效率分工与技术经济因素驱动的全球产业链布局相比,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如下新特征:

###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国际战略竞争的目的性

与传统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市场和资源不同,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既有基于经济动机的自发配置,又叠加了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产业链配置中的国际政治战略考量,使得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在宏观上带有国家层面战略博弈的策源性、目的性与系统性特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关键环节优势与体系性控制能力,以其庞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及外交关系为依托,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进行体系性设计,以“再全球化”等方式对于全球产业链布局施加影响。在一般制造业方面,通过设立进口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推动生产环节重新布局,推动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在制造业高端环节,以技术封锁、技术脱钩等方式严格限制相关技术流入中国。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系统目标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制造业回流,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本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减少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就业岗位、缩小国内收入差距、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水平等;另一方面是力图通过改变传统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结构、地理布局与国家之间的参与机会,“规锁”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底端削弱中国的产业链基础,并以高端产业竞争和技术封锁等方式遏制我国的高端产业发展,加剧我国产业链“上挤下压”的困境。

###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区域化与集团化倾向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不同,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离岸生产网络侧重于分布在邻近的国家和地区。

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产业链区域化重构的重要推动力。为遏制竞争对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制造业回流、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途径,试图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局部产业链分工与经济循环体系,推动产业链分工从全球化向区域化、集团化的方向转变。如在近岸外包方面,美国提出“美洲制造法案”“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等,强调将供应链重置在距离美国更近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区,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并在拉美地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增长机会,以此对抗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力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邻近地区的局部循环产业链<sup>[7]</sup>。友岸外包则强调供应链韧性与供应链多元化,将供应链重点环节放在政治与经济盟

国,提出建立“昂撒”核心供应链体系、日韩等盟友供应链体系。同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以在中国周边构造新的区域化、集团化产业链为抓手,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并提出“亚洲替代供应链”等概念。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出“精准脱钩”等理念,以推进产业链的“去中国化”<sup>[8]</sup>。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将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区域化与集团化,实现其大国战略博弈的目标。

### （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意识形态化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以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划分阵营,在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分工与订单分配环节倾向于向所谓的“友好国家”分包和采购,建立所谓的“友岸外包”供应链。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的发展看作对其发展模式、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挑战,认为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中国致力于“打造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sup>[9]</sup>,并以阻碍和损害中国国际竞争优势的方式维护其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在民主国家之间构建普遍韧性的供应链为抓手,对全球产业链进行切割,打造集团化、阵营化的友链,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其最终目的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划界,以“同类观念”“共同价值圈”国家产业链为幌子,在实质上“规锁”诸如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sup>[10]</sup>,以获得全球产业链重构下国家之间竞争的新优势。

### （四）以高标准经贸规则引领全球产业链主导权变迁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重组、新创或改造国际经贸规则等方式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签署美墨加协定(USMCA)、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引领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并通过构建“印太经济框架”“芯片联盟”等排外的新规则框架,对冲我国的经贸影响力。

从经贸规则的变迁趋势来看,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条件与利益为核心,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国当前的经济与贸易发展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将原产地、国企、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劳动者权利、环境保护、数字贸易等纳入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体系,以“三零”标准(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为导向,形成了国际分工投资与贸

易的转移效应,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分布与贸易流向。以《美墨加自贸协定》为例,该贸易协定不仅规定农产品、汽车零配件等在北美三国之间零关税,而且制定了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引导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内布局,对于区域外的产业链产生了排挤效应。如协定规定,汽车部件在美墨加三国生产比例须由之前的 62.5% 提高至 75% 才能享受关税减免待遇;钢和铝等相关原材料必须有 70% 以上原产于北美地区才能获得关税减免。如此畸高的原产地标准割裂了原有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链分布,在排他性的经贸规则下使得全球产业链分工向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收缩<sup>[11]</sup>。

#### (五) 以各类产业政策作为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工具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摒弃以往标榜的“自由市场”理念,转而采取更为积极、更体系化的产业政策,以实现本国的高端制造业创新、重点制造业回流等战略目标。这些政策内容涉及影响产业链重新布局的多个方面,如技术创新、人才输送、产业补贴、商业环境等,同时呈现出显性化、工具化、战略化甚至“武器化”的特征,以系统地增强本国对于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吸引力与控制力。如在技术创新方面,美国政府一方面以技术封锁、构建“实体清单”等方式,打压和遏制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的高端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出台《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等文件,将制造业重新确定为美国的核心产业,聚焦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国家研发支持与劳动力技能提升。在产业补贴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摒弃其标榜的自由贸易、竞争中性等政策,为了维护自身的科技领先地位,对于特定产业的补贴日益公开化和系统化。如美国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以及劳动力发展提供 527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激励半导体制造业发展,还为芯片工厂提供投资税抵免,吸引世界各芯片公司在美国投资建立新的晶圆厂;出台《通胀削减法案》,政府计划拨款 3690 亿美元用于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项目,支持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氢能等产业的发展,并鼓励相关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等。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注重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科技政策、外资外贸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并联合其盟友、研发合作伙伴、贸易伙伴等协同发力,提升产业政策的作用效力,在推动产业链调整的

同时维护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全球创新领先地位。

### 三、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于我国产业链分工的影响

全球产业链重构使得全球产业分工出现较大改变,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正朝竞争关系转变,这对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产业链结构、贸易流向与产业链升级等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 (一) 改变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与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外循环”的方式将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与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等结合起来,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生动力,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我国传统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传统的面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竞争力减弱;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目标市场的企业从中国向外转移,并构建以边缘化和孤立竞争对手为目标的平行体系,抑制我国产业链升级,迫使其他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体系。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我国在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枢纽性、参与度等均有重要影响,改变了我国参与经济循环的外部条件,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与发展环境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球产业链重构在客观上迫使我国改变了传统的“南—北”分工与贸易模式,加速打破了“中心—外围”的分工格局,对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定位与分工格局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新分工、新结构、新循环的流转模式。例如,产业链断供威胁倒逼我国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进行自主创新,以形成有效的新型国产替代;产业链的区域化、集团化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强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RCEP(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国家的经贸联系。

#### (二) 部分新兴经济体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与资源能源等成本的大幅度攀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2024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 3.3%,每百万元资产的营业收入为 79.5 元,比上年减少 2.7 元<sup>①</sup>,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相关劳动

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向境外低成本生产区迁移的动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打造亚洲替代供应链、西半球供应链等,撬动全球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重新分布,加速了部分产业链环节从我国转移出去。与之相对应,越南、泰国、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我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这些国家不仅劳动力、工业用地等要素价格明显低于我国,而且较少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打压,他们与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大幅削减其对外出口关税。如越南与欧美签订了《东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越南—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等,数千种进出口商品的关税都降为零;泰国出口商品享受美国、瑞士、挪威、俄罗斯等的普惠制待遇,数万种重要商品能够减免10%—100%的关税<sup>[12]</sup>。这些国家或地区凭借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和优惠政策等,成为承接中国纺织服装、鞋类、木制品、食品与电子产品组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产业链分工与贸易的替代效应。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的出口额为3245.9亿美元,全球占比为32.0%,尽管仍然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在全球市场份额中的比重较2015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而越南、孟加拉国则在此期间分别上升了1.0和0.4个百分点<sup>[13]</sup>。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也对我国的贸易地理流向产生了明显影响。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美国自华商品进口占比从2017年21.6%的高位已经下降到2023年的13.9%,从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降为美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全球产业链重构使得部分新兴经济体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

### (三)对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规锁”效应

近年来,我国逐步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节点向高端节点攀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竞争性增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确保本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优势位置,通过封锁核心技术等方式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进行“规锁”,遏制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中能力的提升。如在技术封锁与控制方面,通过不断修订更为严苛的技术封锁规则与长臂管辖原则,以“技术脱钩”手段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知识产权贸易、高技术直接投资、科研合作等诸多领域施加限制,或以“实体清单”等方式在技术、市场、产品、供应链等方面打压我国高端产业链的龙头企业。2019年美国商

务部将华为等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要求美国公司谷歌、高通等不得为华为提供软件及5G芯片,导致华为5G芯片供应及安卓系统服务被切断。2020年5月美国商务部修改规则,责令华为不能用美国EDA软件设计芯片,任何芯片设计工厂、制造工厂不能为华为提供服务。2025年3月美国又将英伟达特供中国的H20/B20芯片纳入禁售清单,以切断我国获取高性能算力的替代路径。此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协同盟友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对华战略遏制与围堵体系。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美国即通过国内立法和行政手段,联合其盟友对中国华为等高科技企业施加投标限制与市场围堵,意图压缩中国5G产业的国际发展空间,遏制中国5G产业的发展能力与发展速度<sup>[14]</sup>。与此同时,在6G通信技术的发展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组建排斥性联盟,在科技研发、产品生产、标准制定、市场价值实现等层面推行排他性的6G推进路径,以遏制竞争对手,确保其处在科技竞争的优势位置<sup>[15]</sup>。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以排他性的全产业链协作等方式,阻碍我国进入高端产业链的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工艺、软件等环节。相关“规锁”措施试图从技术、市场、分工等层面孤立我国进入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阻碍我国的产业链高端化发展。我国相关企业在“脱钩断链”的威胁下,同时面临着技术来源受阻、研发成本上升、出口西方发达国家的不确定性与市场门槛提升等风险,这可能会阻碍我国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降低其国际市场拓展意愿,对于我国相关行业的全球产业链升级产生不利影响。

### (四)倒逼我国加快产业链结构升级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产业链的低端分流和高端封锁,加剧了我国产业链“上挤下压”的发展困境,对于产业链的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都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使我国传统的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新兴经济体竞争白热化的复杂背景下,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链的持续升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防止过早过快地“去工业化”,增强我国产业链的根植性和竞争力。提升产业根植性,从基于可替代的劳动力成本、土地等初级要素,转向基于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科技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生态等高级要素,降低我国产业链过快转移以及“去工业化”的潜在风险。二是从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

嵌入”环节向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升级,尤其要以产业链“链主”环节为抓手,增强对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控制力,提升我国的产业升级能力、治理能力与附加值创造能力。三是要持续地将产业链升级作为我国加大发展动力与转变发展方式的抓手,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推进我国“深度工业化”进程。四是从产业链安全视角看,要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提升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国产替代”的能力,对于我国的关键核心设备、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业技术等逐渐实现国产化替代,提升全球化变局下我国产业链的安全性。五是从全球化产业链的循环方式与升级路径视角看,要以本土市场作为全球产业链竞争力重构的新基点,构建强调联动循环、主动循环和动态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构我国产业链升级的内外部环境,为我国产业链升级提供新型的国际循环条件。

#### 四、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稳定与升级的应对策略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要规避内外部风险,保持我国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相对稳定,积极适应新的全球化条件,加快推动我国产业链转型与升级。

##### (一) 保持我国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相对稳定

当前,随着我国劳动力、工业用地等相关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叠加地缘政治驱动下的“脱钩”与“断链”等风险和挑战,以及通过高关税、技术封锁、市场准入限制等手段进行的贸易战,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链逐渐呈现过快外迁的势头,我国面临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由于全球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突破与升级需要较长的时间,产业链过快外迁使得二者之间存在时间窗口的不匹配性,从而削弱了我国的产业基础,压缩了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的窗口机遇期。在这一条件下,我国首先要保持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基本稳定,保持我国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此,应发挥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的根植性优势,将基于初级要素的根植性优势转变为基于高级要素的根植性优势。在初级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要以我国相对完备的供应链配套体系、科技创新体系、人才红利、新型基础设施等支撑制造业系统性降本增效,增强我国的综合成本优势;要在市场准入、法制建设、开放竞争等方面加强我国市场体系与营商环境建设,稳定民资、外资的投资激励与预期;

要以制度型开放增强我国国内市场对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增强产业链稳定性。此外,以稳定我国产业链为导向,主动优化我国产业链布局,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东部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成本敏感型产业链环节主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形成我国东西部地区分工有序、高效协同的产业链体系<sup>[13]</sup>。此外,还应结合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实际,围绕制造业推进降本减负行动,从融资、税费、物流、用工等方面综合施策,大力为制造业企业减负,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避免在过短时间内由于不利因素的叠加导致产业链、供应链过快外迁,为我国产业链的持续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时间与空间。

##### (二) 构建高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体系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为了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必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构建高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在产业体系布局上,我国要充分发挥新兴产业新质要素集聚、发展前景广阔的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谋划和发展一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未来产业,发挥我国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在市场中验证不同的技术路线,完善未来产业生态体系和早期市场,加速未来产业的生产力转化。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抓新机遇、新赛道,提升弯道超车能力。从区域产业链分工来看,我国要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统筹发展与安全,以“腾笼换鸟”的方式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跃迁升级。同时,鼓励我国中西部地区“筑巢引凤”,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相关产业转移,在更系统、更深层次上优化我国产业链布局。要充分利用我国“世界工厂”的基础优势,以数字化生产要素投入替代传统的劳动力投入,用先进制造替代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当前,我国5G基站总数已达464.6万个,智能算力总规模达788EFLOPS(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居于世界领先地位;5G应用融入86个国民经济大类并不断地向生产核心环节延伸<sup>②</sup>。为此,要通过“机器换人”等方式鼓励企业提升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我国稳经济、调结构、强韧性、提高产业链发展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针对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宽而不深等不足,要着力培育全球产业链链主企业,壮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群体,系统梳理我国关键产业链中的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竞争态势、技术进展、关键技术分布等,在产业精准建链、延链、补链上下功夫,增强对产业链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等关键环节的国产替代力与掌控能力,增强我国产业链的韧性、稳健性和整体安全性。

### (三)以本土“世界一流企业”为抓手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竞争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世界经济竞争的第一方阵企业,也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竞争力的关键。我国本土“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产业链龙头企业,对我国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重塑国际分工地理布局的关键抓手。从横向整合视角看,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产业链龙头,有利于推动产业链内部分工体系的建立,带动提升产业链技术水平与竞争优势,联合同行业上下游的众多中小企业形成自主的分工与协作网络,与我国本土的生产力产生深度关联,从而带动本地企业成长,是开拓国际市场、打通国内国际大循环的关键市场力量。如苹果公司超大的供应链网络遍布中国、日本、美国、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等世界各地,使得“苹果链”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供应链之一<sup>[16]</sup>。从纵向整合视角看,本土的“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以创新需求拉动和整合创新链的诸多环节,能够与本土创新要素以及基础研究能力产生深层的良性互动,是本土创新链与产业链整合的关键枢纽。如华为公司不仅注重应用技术开发和市场推广,而且在5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持续性、长周期地布局基础研究,全链条、宽领域地推动企业创新,从而在通信与计算技术突破、人工智能理论创新、数学与博弈论突破、基础研究与平台支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支撑企业全球产业链竞争力突破。因此,我国要更加重视培育本土“世界一流企业”,并重视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核心价值,挖掘“一流企业+本土供应链体系”“一流企业+本土科技支撑体系”“一流企业+国内国际市场”的协同整合能力,以本土“世界一流企业”为抓手,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竞争力与控制力。

### (四)提升我国产业链各环节的核心技术攻关与主导能力

在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外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处在较低的国际分工位置不仅导致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

险,而且导致了我国产业链高端环节与本土创新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衔接,加剧了我国对外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依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卡脖子”技术的垄断加大了我国的产业链升级难度。同时,技术封锁加剧与产业链“断供”威胁要求我国必须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国产替代”能力。因此,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强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与国产替代能力。要聚焦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技术链中的“短板”“缺项”,将基础研究与产业、企业层面的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以及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结合起来,以战略科技力量支撑我国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与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实现创新突破。要瞄准我国国产化率极低的产业链“卡脖子”环节,对产业链细分行业制定精准的科技、人才、财税、融资、贸易等支持政策,以增强我国相关企业的“国产替代”激励。在核心技术的需求牵引方面,要加大国产替代创新产品的推广力度,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的优势,支持国内制造业企业逐步导入国产材料、零部件、设备和软件,形成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以下游带上游”的产业链关键环节升级路径<sup>[17]</sup>。要以我国本土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为依托,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吸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打造高端产业的重要载体与引力场的作用。

### (五)构建有利于我国产业链升级的新型国际循环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要着眼于我国产业链升级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内在联系,维护有利于我国产业链稳定与升级的国际经贸环境。在努力稳定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分工与经贸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前全球化“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变化格局,在外交方面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主义,加强南南合作,持续深化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的合作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集团扩容等为契机,深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完善经贸合作网络。在贸易规则方面,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全球治理规则的同时,积极参与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推动区域内相互开放、互惠共赢。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对先进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与集聚力。在国际分工与贸易合作方面,要以培育新型比较优势为导向,提升我国

新质生产力的出海能力,推动我国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的国际生产与贸易,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拓展我国产业链升级的有效路径。在对外合作的重点区域方面,充分利用我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地缘邻近优势,推动基础设施、交通物流、市场与制度规则的一体化,推进在相关区域实现扩链型对外投资,强化区域产业链的上下游投资和贸易联动,构建更为紧密的区域供应链合作关系,减轻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链的“围堵”压力,对冲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不利影响。

#### 注释

①《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3%》,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1/content\\_7001385.htm](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1/content_7001385.htm), 2025年1月27日。②《数字新基建释放强劲动能》,中国经济网, [http://m.ce.cn/bwzg/202510/t20251009\\_2506579.shtml](http://m.ce.cn/bwzg/202510/t20251009_2506579.shtml), 2025年10月9日。

#### 参考文献

- [1] 郭宏, 伦蕊.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J]. 中州学刊, 2021(1): 31-38.
- [2] 杨丹辉.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关键影响因素[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4): 32-40.
- [3] 周祺. 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与中国产业链升级研究[J]. 东岳论丛, 2022(12): 129-136.
- [4] 屠新泉.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J]. 当代世界, 2023(7): 24-31.

- [5] 刘志彪, 李鑫溟. 以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J]. 亚太经济, 2025(3): 1-16.
- [6] 黄新飞, 郭瑞琪.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出口韧性塑造: 挑战、机理与路径[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1): 48-62.
- [7] 章婕妤. 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合作: 现状、动因和前景[J]. 太平洋学报, 2023(2): 56-67.
- [8] 杨勇, 胡渊. 逻辑、策略与影响: 安全化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去中国化”产业链重塑[J]. 当代亚太, 2025(2): 31-59.
- [9] 程慧, 邢政君. 中美博弈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态势与走向[J]. 国际经济合作, 2025(1): 23-32.
- [10] 邢亚杰. 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评析[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3(4): 94-111.
- [11] 白洁, 苏庆义. 《美墨加协定》: 特征、影响及中国应对[J]. 国际经济评论, 2020(6): 123-139.
- [12] 范保群, 郑世林, 黄晴. 中国制造业外迁: 现状和启示[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11): 85-99.
- [13] 刘娅, 梁明, 徐斯, 等. 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与应对策略: 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性的分析[J]. 国际贸易, 2023(5): 3-13.
- [14] 林梓瀚, 游祯, 魏伟. 全球 6G 发展竞争态势研究及趋势研判[J]. 信息安全研究, 2022(11): 1135-1140.
- [15] 王辛未, 李军凯, 张添.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的 6G“边疆拓展”战略研究[J]. 情报杂志, 2023(12): 25-30.
- [16] 唐宜红, 张鹏杨. 提升对外迁产业供应链的可控力: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问题研究[J]. 开放导报, 2022(4): 7-14.
- [17] 于畅, 邓洲. 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的方向调整与推进策略[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55-62.

## Research on the St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Shang Tao Fan Zengqiang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experiencing an unprecedente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a century, and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pattern is facing profound restructuring and readjustmen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divis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current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is driven by multiple overlapping factors,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and it presents prominent trends of regionalization, bloc formation, ideolog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has altered China's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some emerging economies on China has intensified, exerting a certain “lock-i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nd industries, which has forced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upgrading of its industrial chai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China should maintain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its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construct a high-end industrial chain and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by taking local “world-class enterpri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addition,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for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leadership in each link of its industrial chain, and foste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at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strategic game; industrial chain transformation-upgrading

责任编辑: 刘 一